

语文的阐释

申小龙
著



国
学
丛
书

语文的阐释

申小龙 著

辽新登字 6 号

国学丛书

语文的阐释

——中国语文传统的现代意义

申小龙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50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 1/2
印数：1—834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贾非贤 俞晓群 刘瑞武 王越男
封面设计：安今生

ISBN 7-5382-1594-8/H·37

精装定价：17.70 元

語文的闡釋

中國語文傳統的現代意義

申石伽題





作者简介

申小龙，1952年9月出生，上海人，祖籍浙江杭州。现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文学博士、副教授，江西大学语言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并任中国语言文化学会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语文学会理事，英国《宏观语言学》杂志副主编。已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12部。主要著作有：《中国句型文化》、《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申小龙论文集》、《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汉语人文精神论》、《中国文化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言变异与社区文化》、《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语言的文化阐释》等。主编“文化语言学”丛书、“大千语言世界”丛书、“当代中国语言学”丛书、《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当代中国语言学论纲》、《中国语言学大辞典·语言学史卷》等。曾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学术成果特等奖，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学术著作一等奖，全国语言与文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汉字文化学术二等奖，“光明杯”全国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三等奖，并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国学丛书》序

张岱年

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二十世纪初年，国内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了《国学概论》的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

中国传统学术内容丰富，包罗宏广。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用今天的名词来说，义理之学即是哲学，考据之学即是史学，词章之学即是文学。后来注重国计民生的学者更提倡经世之学，即关于政治经济的学问。这些都是人文科学，不包括自然科学。在此之前，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将学术分为三种：一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二通几之学，即哲学；三宰理之学，即关于社会政治的学说。方以智论通几与质测的异同，强调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有其独到之处。

以上这些关于学术的分类，都未免简而未备，中国的传统学术实较此为宏广。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的典籍目录来

考察中国学术的内容。《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将书籍分为六类：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六艺是经学，包括“小学”，即文字学。诸子是哲学政治学说，诗赋及诸子中的小说家是文学，兵书是军事学，数术包含天文历法，方技指医学。在《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自然科学及军事学居于显著的地位，而经学居于学科之首。《汉书·艺文志》之后，传统的目录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清代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可谓集传统目录学之大成。《四库全书总目》之中，经部是经学，包括小学；史部是史学，包括地理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小说以及释道典籍。集部是文学。《四库总目》将哲学、自然科学及宗教都归入子部，不如《汉书·艺文志》将数术、方技与诸子并列。

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其中最发达的是医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內容。

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这是我们所用的名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了。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现在亦译为中国学。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Sinology不过是对于中国历史陈述的研究，把中国学术看作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事实上，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国学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具有历久常新的精湛内容。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灿烂光辉的中国文化，

对于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语云：“国有与立。”

（《左传·昭公元年》“国于天下，有与立焉。”）我们中国必有其足以立国的思想基础。这立国的思想基础即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精湛思想。中国古代哲学是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之一，先秦哲学可以与西方古希腊哲学媲美，宋明哲学的成就超过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国的文学艺术亦独具特色。二十年代曾经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然而近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撰写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曾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不过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而已。

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以往的学术成就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研究国学，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容，可以说是瑕瑜互见、精粗并存。其中既有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知灼见，至今犹能给予人以深切的启迪；亦有违背客观实际的谬妄之说。我们研究传统学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清除历史上从古流传下来的污垢，发扬前哲已经揭示的相对真理，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当然，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开拓认识真理的道路，揭发前人尚未发现的真理。但是，创造性的思维仍以通晓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为必要条件。

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方面要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史昭告年轻一代；一方面要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的优秀成果昭告国人，藉以启发热爱祖国崇高感情。古语说：“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礼记·学记》）如果不接触中国学术的内容，怎能了解其真实价值所在呢？认真钻研祖国的学术思想，以科学方法加以分析整理，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辽宁教育出版社有鉴于

此，提出编印《国学丛书》的计划，意在承继前贤志业，融会近代以来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的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与意义。我代表《国学丛书》编委会略述此丛书的宗旨与编辑旨趣，希读者鉴之！

1991年3月

序于北京大学

作者前言

我于1978年初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从事语言学的学习与研究。当时吸引我的是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无意中成了复旦外文系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理论语言学教研室的一系列课程和讲座的常客。我的学士学位论文选择了当时正在引进的美国生成语言学的深层结构理论。我试图弄清这一在当时颇有代表性的西方语言学前沿理论意义何在？同时，更重要的，它能否适用于汉语的理解和分析？为此我啃起了大本的原著，作了大量的笔记和摘译。在一个大雪天遇到一位外地高校来沪办事的研究生成语法的学者，我竟跟着他在市里转了大半天，不停地与他讨论，直到冻得两脚发麻。我在研究中发现，“深层结构”并非如它的提出者乔姆斯基所说是一种句法结构，它实际上是语法学对句子中词的系列之特性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后得出的一个结果，它本质上是一种语义结构。乔姆斯基利用深层结构这一理论假设，不露声色地将语义问题纳入了句法框架。然而正是由于深层结构的这种微妙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思考，并触发了语言学界关于句法和语义问题的大辩论。深层结构的性质、地位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它虽经乔姆斯基几易其法，但仍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乔姆斯基本人既想努力解决

语义问题，又囿于结构主义成见不能自拔的窘相，照出了生成语法学同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深刻的渊源关系，也照出了现代语言学的严重缺陷——语义问题、语义的形式化问题。如果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即使想在语法中引入语义因素也不容易办到。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深层结构”的提出标志着语言学的“狭隘”时代已经结束。它不仅使语义研究同形式语法紧密结合，大大深化了语法分析，而且促使整个现代语言学出现语义化的倾向，对工程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代语言学趋向于建立太学科。然而，深层结构理论本身显示的新的裂缝、新的怀疑、新的问题更要多得多。人们无法企望深层结构根本解决语义问题，人们也无法以句法为中心来控制语义、句法、语音三者之间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为制约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和语言的关系并不只是一维的、平面对立的关系。语言不仅仅是人所面对的一个客体，一个可以通过追求确定性和形式化而界定其内涵的客体。语言是人性的具体表现，是人与世界的根本纽带，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样式。它体现着人与世界多方位的联系，它是人类世界存在的一部分。对于这样一种以人文性为其根本属性的文化现象，任何公式化的系统都无法加以规范。因为在其抽象化、形式化的过程中，它省略得太多，舍弃得太多，置许多根本性的语言事实而不顾，因而无法对语言现实有很强的解释力。

深层结构理论的研究使我对单纯依靠西方语言理论解决汉语构造规律问题产生了怀疑。尽管我的学士论文《论深层结构》因被评为上海市七七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而获奖，并发表在《复旦学报》、《学术月刊》等刊物上，但我希望在进一步研究之前，能够对人类文明在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语文传统

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于是，我在硕士学位的专业方向上选择了古代汉语。我有幸得到了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的悉心指导，他就是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张世禄先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快要一个世纪了。在这八九十年中间，研究、学习汉语语法的，几乎全部抄袭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或者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做基础，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有时发现一些汉语语法的特点，觉得为西洋语法学上所不能概括的，就陆续加以增添补缀，越到后来，发现的特点越多，这种增添补缀的地方也越繁。表面上语法体系好象较前精密了，实际上却是使学习的人越感到烦琐和难懂难记了。其所以“繁”“难”，是因为原来建立这种体系是根据于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是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来做基础，受了许多洋框框束缚的缘故。尤其在词类、结构形式和句子类型方面，洋框框像绳索捆着本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使它不从正常健康的方面发展，而向着复杂畸形的方面发展。是因循不改，让它继续受许多洋框框的紧紧束缚呢？还是起来革命，打破许多洋框框，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这正等待着我们的汉语学界的抉择。张世禄导师提出的这个问题，促使我选择了“《左传》句型系统”这一个实证性很强的课题。我试图通过对古汉语句法的详尽的研究来探讨汉语语法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并开始认识到中国语文传统的意义：它为汉语的理解和分析提供了与西方语文迥然异趣的途径和可能。

这时候，我校的另一位语文大师郭绍虞先生的论著引起了我的注意。郭先生以其深厚的传统语文语感和睿智，对汉语独特的构造规律提出了精湛的见解。例如他指出：“汉语语法的灵活性是建筑在单音孤立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形态变化上

的。各种语言都有多种多样的不同说法以表达极为复杂的思想感情，但是语言的本质不同，当然表达的形式也不会相同。在形态变化上表达多种多样的不同说法，那还是比较容易的。而汉语则是在同一形式上表达多种多样的复杂的思想感情，这就特别显出汉语语法的灵活性与复杂性了。”又如郭先生指出：汉语句子的组织，好似儿童玩的积木，可以利用种种不同的词组块，照事实发展的自然次序，组成完整的句子。一个词组就是一个音句，从音句进为义句，就是积词组而为句的表现形式。

“我们要深切理解汉语语法的本质，必须注意到汉语的音乐性与顺序性这两个问题。”再如郭先生指出：汉语的造句既然以词组为单位，那么汉语句子的主语就不受核心动词的制约。任何一种词组之后都可以作一停顿。这一停顿，在语气上往往使这种句首词组成为一种言谈的题目，从而暗示了全句的发展脉络。西方语言的造句是以动词为重点的，汉语造句是以名词为重点的。我深为郭绍虞先生对传统语文的理解所折服。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对汉语的结构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句法作用弱化，语义作用凸显。这与当时语言学界以形式为纲，从形式入手“发现”意义的“流行色”形成极大的反差。这就促使我在汉语语法研究方法论上开始了深入的反思。1984年，我在《学术月刊》上发表《论中国语法学的方法论》，随后在多家刊物上连续发表了方法论反思的文章，全面批判了自本世纪初以来汉语语法学模仿西方语法的范畴和框架。这一研究获得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1979至1985年优秀学术成果特等奖。

在方法论反思的同时，我开始探讨具有汉语特点的语法范畴和框架，提出了“主题句”的假设。我在三年硕士学位的研

究期间，将《左传》的全部句子做成资料卡片，用专书穷尽性的材料研究方法，论证了“主题句”这种汉语特有的句型，指出了这一句型的发现在语言类型学上的意义。由于这种句型的认定既不能从形式出发，也无法在西方语法的范畴中寻找，而须以表达功能作为句子的认定标准，这就支持了我对汉语语法特质的看法。硕士论文《〈左传〉主题句研究》被答辩委员会评为“难得的、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发表在《中国语文》杂志上。“主题句”虽然只是建立一个汉语语法范畴或者说句型范畴的具体问题，可它实质上提出了一整套汉语语法分析的新原则。它使语言学家们思考：汉语分析能不能以语义和表达功能为纲？汉语语法体系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印欧语言理论先入为主的影响，在汉语文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方法、体系？

1985年，一个偶然的机，我陪祖父申石伽到复旦讲学。祖父是著名画家。在他对中外学生作中国绘画理论的形象的演示中，我顿悟中国艺术形态与中国语言形态在文化精神上有着深层通约性。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在《语文导报》上发表了《语言研究的文化学方法》，提出汉语特点、汉语规律的揭示应该向中国文化认同，而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种种困惑和弊端，就是因为它先验地视西方语言规律为人类语言的共性，缺乏民族文化认同的自觉，始终无法真正把准汉语的特点。我又进一步发现，这种“以洋律中”的语言学思路不仅反映在语法研究上，而且反映在汉字改革、汉字“拉丁化”的理论与实践上。方块汉字是一种表意性很强的文字。这种表意性长期以来被汉字拉丁化理论视为汉字的“劣根性”，然而它却是适应汉民族语言思维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的特点

的。汉字拉丁化理论按照西方语言学关于“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的基本原理，认定最先进的文字就是作为口语化身，能忠实全面记录口语语音的文字。其实文字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克服语言音响的时空局限。文字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视觉形式，以图象作用于视觉神经，产生条件反射来实现字形和字义的统一，“形入心通”，不必经过语音的中介。汉字以其智慧的形声配合的基本结构方式，既保持了汉字的图象性，又使汉字能适应语言词汇的增长，从而实现了超方言超时代的独立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言语异声的统一，传承了文明古国一代代绵延不息的文化。为此，我又撰写了《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一文，第一次提出西方文字的从象形到表意又到拼音的发展阶段并非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规律。中西文字同样从象形的起点出发，西方文字发展为一种纯拼音文字，汉字却没有拼音化，这并不是发展速度的差异，而是发展方向的不同。这篇论文提交《学术月刊》后，因其观点与几十年汉字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的定论大异其趣，编辑踌躇再三。最后，该刊主编、著名语言学家罗竹风亲自定夺，云：“学术问题应该百家争鸣”，终于发表在该刊1985年的青年学者专号上。

汉语研究中在语法和汉字问题上的文化偏差，促使我对汉语的文化性征和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文化断裂作了深刻的反思。我认为汉语的所有特点都是它浓郁的人文性的体现。这是中西语言最为根本的差异。西方语言丰富的形态标志，使西方语言学较易形成一套形式化的分析程序和与形式化相应的理论目标与体系。但这样一种经西方描写语言学科学主义化的传统，一旦全盘照搬来分析非形态而有很强人文性的汉语事实，就必然

“左支右绌，困不可忍”。中国现代语言学肤浅地认定人类语言作为一种自然符号系统是大同小异的，汉语的特点可以通过对“洋框框”的不断修补完善来加以反映，于是这种畸型的“洋框框精致化”成为“科学化”的同义语。汉语的人文性与汉语学的科学主义，这就是近百年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根本矛盾。要克服这一痼疾，就须寻找一种与汉语的人文性相适应的语言分析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方法在整体精神上放弃（但可以借鉴）西方语法的框架之后，可以有两个科学的参照点：

其一，汉语与中国哲学、艺术、文学、美学乃至思维方式方面所具有的文化通约性。这种通约性使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其他样式入手反观汉语的建构特点，从较深的层次上把握汉语的文化性征，以此规定汉语的整个结构蓝图。

其二，中国古代语文分析传统中所运用的范畴和方法。这些范畴和方法贴近中国人的语感，在加以科学地整理和阐释后，能够转化为现代汉语分析的基础。

1986年初，复旦大学召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和继承研讨会。我在提交会议的论文《文化断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中系统地阐述了我上述思想。这篇文章在《复旦学报》发表后，《新华文摘》等刊物相继转载。我又以这篇论文为纲写出了我的第一部专著《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指出：“我国现代语言学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它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冲击下诞生，又在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成长。它对汉语和汉民族文化的适应性究竟如何，在它从20世纪走向21世纪的时候，对它的本体论、方法论和发展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它的质态和中国现代语言学者的文化心态究竟有何内在的联

系，这些都是很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的。申小龙把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归结为‘汉语的人文精神与汉语学的科学主义’，这一概括是十分深刻的。它的文化内涵，理智力量和富有穿透力的思辨色彩，显示出新一代语言学者蓬勃的朝气，巨大的潜力和极其可贵的历史使命感。”我的学友，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张汝伦为此书写了长达三万言的书评《语言与文化传统》，发表在他的《张汝伦集》和1987年第11期《读书》杂志篇首。他指出：

“（申小龙的研究）充满了一种历史使命感。‘只有五种语言在传布文化上有过压倒优势，它们是古典汉语、梵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和它们比起来，甚至像希伯来语和法语这样的文化上很重要的语言，都落到次要的地位。’（萨丕尔《语言论》）可是汉语研究的现状却令人汗颜。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一种语言，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一个独立的语法体系。虽然人们可以说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但这个事实无疑有着深刻的文化史和哲学上的教训与含义。作者是深刻的，虽然他的专业是语言学，然而他却从文化发展史和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反省这一现象。他通过周密的纵横两个方面的分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后不久，我在《读书》、《学习与探索》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有关语言与文化传统的文章，形成第二个论文系列。这些文章在语言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与争鸣。国内许多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指出这一讨论“唤醒了中国语言学界的民族意识特别是民族自尊心，激发起中国语言学者的革新与探索的热情”，“是中国语言学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日本、台湾、香港的语文刊物也纷纷发表评论，指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语言学继承和发展的新的开端，将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